

共产国际 与中国革命关系 论文集

向 青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
论 文 集

向 青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陈敬山
封面装帧 杨德鸿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

向 青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4 字数 320,000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500

书号 3074·723 定价 2.65元

目 录

共产国际的理论、策略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

作用·····	向 青(1)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	向 青(50)
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建立联系的探讨·····	向 青(79)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共产国际	
关于中国革命政策·····	向 青(87)
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山舰事件·····	向 青(100)
大革命紧急时期共产国际指导中国	
革命的政策、策略·····	向 青(121)
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和李立三“左”倾错误的产生·····	向 青(144)
共产国际和王明“左”倾错误统治·····	向 青(155)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策略·····	向 青(181)
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国际共运中坚持	
抗日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	向 青(200)
共产国际解散后斯大林、联共(布)和中国革命·····	向 青(223)

• 附录 •

共产国际代表等主要人物

介绍·····	向 青 石志夫 孙 岩(248)
---------	--------------------

中共代表等在共产国际的活动

介绍.....	向青 石志夫 孙 岩 (313)
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指示、决 议、文件简介.....	向青 石志夫 孙 岩 (394)

共产国际的理论、策略 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作用

向 青

共产国际从一九一九年三月成立到一九四三年六月解散的全部历史时期中，它的理论思想、政策策略，对于中国革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相互联系，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帮助作用、指导失误以及它同日益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利益一致性和存在着的矛盾斗争，都是通过理论、策略表现出来。因此，评价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作用，主要在于评价共产国际的理论、策略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作用。

为了比较深入地探讨共产国际理论、策略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作用，下面打算从共产国际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和苏联援助下的国共合作战略、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左”倾错误、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独立自主等三个方面，分别加以阐述。因为上述三个方面分别反映了一定的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条件，反映了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反映了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不同历史特点。

一、共产国际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 和苏联援助下的国共合作战略

从共产国际成立到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是共产国际提出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和形成苏联援助下国共合作战略的历史时期。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中国先进分子为走俄国革命道路而寻求同俄国革命建立联系。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共产国际建立。共产国际的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是通过列宁向共产国际二大撰写《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而正式提出的。从此以后，在共产国际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指导下，形成了苏联援助下的国共合作战略。由于共产国际从组织上加强同中国革命的联系，上述战略得以实现，中国革命运动因之兴起。但是，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开始，共产国际关于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的原则被教条化了，致使中国革命遭受挫折，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第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国先进分子寻求同俄国革命建立联系。

共产国际提出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和对中国革命产生影响，是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基础上发生的。

俄国是中国的毗邻大国，俄国革命能够很快地影响到中国，但是，俄国革命的中心地带是远离中国的，西伯利亚地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兴衰，更直接地影响着中国。本来俄国十月革命后，西伯利亚地区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一度开始高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在哈巴罗夫斯克曾经召开了全远东苏维埃协商会议，建立了西伯利亚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①，选举了布尔什维

① 亨利·诺尔敦：《西伯利亚远东共和国》一书，第54页。

克著名领导人克拉斯诺施切柯夫为执行委员会主席。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布尔什维克党在中东路宣布起义，后受到黑龙江省督军鲍贵卿的镇压。但是，一九一八年夏天，日、美、英、法派兵干涉西伯利亚，沙俄黑海舰队司令高尔察克、哥萨克人谢米诺夫、中东路督办霍伐斯三股白匪蜂起，十月，西伯利亚苏维埃政权完全消失。十一月，高尔察克在鄂木斯克出任“全俄最高执政”。中国北洋军阀政府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封闭了中俄交通，八月二十四日又发表宣言，参加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

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虽然已经开始，但是未能立即发展成为广泛的传播，而且这时马克思主义传播还仅限于欢呼俄国十月革命和介绍马克思著作的一般观点，但这却反映了中国先进分子要走俄国革命道路和寻求同俄国革命建立联系的愿望。

李大钊是十分重视俄国革命动向、极其赞助俄国革命并寻求同俄国革命建立联系的革命者。李大钊说：“俄国位于欧亚接壤之交”，要“翘首以迎世界文明之曙光”^①。一九一九年二月，李大钊又说：“由乌拉山至亚尔布士山，其间的城市，大半成了社会主义根据。……但是这种革命，决不止于中欧一隅，……我们中国也许从西北陆地、东南的海岸，望见他的颜色。”^②共产国际建立以前，在中国只有李大钊关心着共产国际的建立。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四日，俄共（布）等发出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邀请书》。二月一日李大钊就著文说：“为了解放的运动，旧组织遂不能不破坏，新组织遂不能不创造。”又说：“中欧的

① 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载《言治》（季刊）第3册，1918年7月1日出版。

② 李大钊：《战后之世界潮流》，载《晨报》1919年2月7、8日。

社会革命一经发动，世界的社会组织都有改变的趋势，为应世界生活的必要，这国际组织、世界组织，是刻不容缓了。”^① 尽管李大钊为找寻同俄国革命建立联系而作出了努力，但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取得成功。

孙中山是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所经历的挫折和失败，使他赞助俄国革命。十月革命前，列宁和孙中山之间就有所了解。一九一二年列宁写了《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说孙中山的思想“是真正伟大人民的伟大思想”^②。俄国十月革命后，孙中山在一九一八年春天打电报给苏俄政府，祝贺俄国革命的成功。这封电报不是孙中山直接打给列宁的，而是先打给美国华侨，再由美国华侨打给苏俄政府的。电报说：“国民党对于你们国家革命党所经历的艰苦斗争，表示高度的敬意，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在一起，进行共同的斗争。”列宁收到孙中山电报后，便令齐切林回信给孙中山。一九一八年八月一日，齐切林给孙中山回信。信中回答说：“这个时刻，俄国劳动阶级向往着中国兄弟和期望同他们进行共同的斗争。”可是，信中也说：“帝国主义政府、资产阶级爪牙的军队铁环般的包围……把我们同中国南方无产阶级的友谊截断了。”但是，齐切林的信未能送到孙中山手里^③。

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是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继续，它的成立是有历史必然性的。列宁很早以前就要建立共产国际，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共产国际成立提供了现实性。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德国共产党诞生，有力地促进了共产国际的成立。十二月

① 李大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载《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1日出版。

② 《列宁全集》第2卷，第424页。

③ 见叶菲莫夫：《孙中山——找寻道路1914—1922》，第98—99页。

二十四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苏俄外交部向各国共产主义者发出电报。一九一九年一月几个党的联席会议之后，一月二十四日向外界播送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邀请书》。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列宁主持召开了部分代表的预备会议，德国共产党代表埃伯莱恩认为新的国际需要建立，但时机还不成熟。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至四日晚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由于一些新代表到会，建立国际的要求益加迫切。特别是奥地利代表斯廷哈特经过十七天行程到达会场，他的充满激情的发言，给会议以很大影响。表决结果除德共代表埃伯莱恩弃权外，有三十三个党和团体同意建立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进行到六日结束。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宣言》、《共产国际纲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等。

共产国际一大无论从内容到组织都注重欧洲革命。虽然东方国家也有代表参加会议，但会议没有对东方革命进行具体论述，也没有东方代表参与共产国际领导工作。这一情况，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是俄国革命影响范围所决定的。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中国国内绝无可能派出自己的代表出席这次会议，“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刘绍周、秘书张永奎以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义出席了会议，进行了表决，刘绍周在列宁主持下作了发言^①。

共产国际建立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历史事件，但在当时却没有对中国革命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先进分子通过资产阶级通讯社的内容粗略，与事实悬殊的报道，得知了这一消息。如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北京《晨报》所转载的外电竟说：“国

^① 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记录），第242—243页。

际共产党员本月十五日在莫斯科开成立大会，各国党员均派代表列席，当场公推列宁为议长”等^①。

第二、共产国际二大确立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苏联援助下国共合作战略逐步形成。

从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到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其间只有一年多时间，但苏俄政治形势却发生了重大变化，赢得了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决定性胜利。这一胜利，在西伯利亚广大领域里表现了出来。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列宁《给东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表明对收复乌拉尔地区抱有很大的决心，同时也说明苏俄政治形势还相当严重。列宁说：“如果我们在冬季以前不能收复乌拉尔，我认为革命的灭亡就不可避免了。要全力以赴。”^②事实证明，列宁的决心取得了成功。一九一九年六、七月，苏俄红军收复了乌拉尔中心地带，向东进发，八月进抵托博尔河。苏俄红军得到了高尔察克后方声势浩大的游击运动的支持，从而越战越胜。秋天，托博尔河大激战，高尔察克军队被击溃。十一月二十四日，苏俄红军攻克高尔察克的“首都”鄂木斯克。一九二〇年一月六日，高尔察克白匪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大部被俘，高尔察克也被活捉，二月被处决。四月，美国和其他国家干涉军支持不住，撤出了西伯利亚，只有部分日本军队撤到了滨海地区。四月六日，远东共和国在外贝尔加尔地区建立。

西伯利亚政治形势决定了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建立。早在一九一九年，俄共(布)地下组织就企图同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到一九二〇年春天，中国北京政府同苏俄关系改善，

① 见《晨报》1919年3月27日第2版。

② 列宁：《给东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列宁全集》第35卷，第391页。

远东共和国已成为苏俄和中国北京政府建立联系的跳板。于是，俄共(布)远东地区组织派魏金斯基及其妻子库兹涅佐娃以及马迈耶夫、斯托扬诺维奇、波林、杨明斋等组成俄共(布)小组来中国。魏金斯基在北京会见李大钊后，又赴上海会见陈独秀。之后，吴佩孚进北京执政，远东共和国优林使团来到了北京。这时，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不仅范围更广泛，而且有共产国际使者参加，直接传播了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所以，中国先进分子认为中国也如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一九二〇年八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建立，直至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都是以上述思想为指导的。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是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上月七日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从斗争纲领和组织制度完善了刚刚建立的共产国际。受政治形势影响，东方人民革命问题更为具体地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时，欧洲无产阶级革命遭受了挫折，共产国际二大期间的俄波战争，未能唤起波兰和德国革命，波兰人却把苏俄红军当做敌人。然而，这时的远东情况不同，苏俄红军进军西伯利亚极为顺利，建立缓冲国远东共和国的策略取得成功，苏俄和北京政府的敌对状态宣告结束。为此，一九二〇年七月共产国际二大之前就发出呼吁，在巴库召开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继续号召欧洲革命，说：“世界无产阶级正面临着最后的决斗。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进行公开的国内战争的时代。”^①但列宁为共产国际二大撰写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进一步地指出了共产国际在东方

①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任务的提纲》，载珍妮·德格拉斯选编：《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第162页。

人民革命中的任务。列宁说：“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列宁还指出：要“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殖民地和一般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之间实现尽可能紧密的联盟”，说要用“建立‘劳动者苏维埃’等方法把苏维埃制度的基本原则应用到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去”^①。共产国际二大成立了民族殖民地委员会，马林为书记。会上印度人罗易曾同列宁发生争论，罗易不同意列宁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估计，否认民族资产阶级有重要历史作用，他说：东方革命主要应由东方无产阶级领导。共产国际二大通过了列宁提纲，也通过了一个由罗易起草的提纲，后来经列宁同意，把罗易提纲作为列宁提纲的《补充提纲》附后。共产国际二大通过了《共产国际章程》、《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等许多文件。

中国出席共产国际二大的代表是刘绍周、安恩学，在讨论民族殖民地革命时，刘绍周作了发言。

共产国际二大同共产国际一大不同，它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其原因，不仅由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已经建立，更重要的是共产国际关心中国革命，会后又委任马林为共产国际代表，派赴中国去贯彻共产国际二大决议。

马林来中国以前，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在中国联合的是吴佩孚，后来由于中东路、外蒙古等问题同吴佩孚发生了纠纷。一九二〇年秋天，共产国际使者魏金斯基虽然曾经同孙中山会见，但总的说来他也是联合吴佩孚的。一九二一年春天，魏金斯基返回了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远东局，张太雷也被派赴伊尔库茨克，

①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选集》第4卷，第275页。

接着，张太雷前往苏俄参加了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十二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马林是一九二一年四月动身，六月到达上海的，他同尼克洛斯基一道于七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而后便全力从事于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马林来华后不久，优林使团便于八月返回了远东共和国。年末，苏俄派斐克斯使团来北京，他们同吴佩孚的交涉一直陷于僵局。所以，马林便实行战略转变，由联合吴佩孚转变为联合孙中山。为了联合孙中山，就要使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所以，马林在上海首先同国民党上海总部张济接触，组织了国民党同共产党等组成的中国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和各革命团体的代表团。一九二一年十二月，马林在张太雷陪同下前往桂林，同孙中山会见。一九二二年一月，马林从桂林去广州，考察了国民党和广东工人运动，而后返回北京，向斐克斯递交了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苏俄政府的报告。四月，马林在上海同陈独秀就国共关系问题进行讨论，在讨论中发生了分歧。马林主张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陈独秀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马林为了克服分歧，实现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国共合作，于四月二十四日离开上海，七月返回莫斯科。在此期间，少共国际代表达林也从事了国共合作的工作。达林于四月底到广州，他同孙中山会谈五、六次。

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走后，同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基本思想，保留了共产党人是否加入国民党问题。但是，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听取马林报告后，作出了支持马林的决议。马林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工作中，明显地抬高了国民党的作用，贬低了共产党的作用。说国民党是知识分子、华侨资产阶级、南方士兵、工人的“各阶级联盟”，说中国共产党人

“不懂马克思主义、缺乏社会主义实践”。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支持马林的决议后，马林同苏俄特使越飞一道于八月回到中国。越飞在北京同北京政府谈判，马林在杭州参加了中共中央西湖会议，通过了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议。此后，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孙中山和越飞在上海发表了宣言，宣言违背列宁《民族和殖民地提纲初稿》有关“建立‘劳动者苏维埃’”的观点，宣称：苏维埃制度“不能应用于中国”。在孙越宣言发表前夕，陈独秀、刘仁静、王俊等出席了一九二二年十一、十二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拉狄克继续抬高国民党、贬低共产党，认为“中国议事日程上”没有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任务^①。大会通过了《关于东方问题提纲》，提纲具有同样右倾观点。一九二三年一月，共产国际作出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国共关系的决议》，这一文献的基本思想同共产国际一系列文献指导思想一致。这样，同年六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宣言宣称：“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但会议批评了国民党“依赖外力”、“专力军事”两大缺点。

一九二三年下半年，共产国际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已经在中国发展成了共产国际关于苏联援助下的国共合作战略。这一战略是共产国际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在中国的重大发展，但这一战略也带有“苏联利益中心”、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以及包办代替等种种错误倾向。

第三、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联系加强，中国革命运动兴起。

一九二三年底，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联系有了加强。这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的，最重要的是苏联政治地位的巩固。一九二

^① 赫文穆特·格鲁伯：《苏俄控制下的共产国际》一书载有拉狄克发言《关于东方问题的意见》。

二年十月，远东共和国派军队进入海参崴，恢复了日本占领的最后一块土地，作为缓冲国的远东共和国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十一月十五日，远东共和国正式并入苏俄，一九二三年一月，建立了苏联。到了一九二三年底，苏联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对内进行和平建设，对外谋求同各国恢复外交关系，同时迫切需要同各国革命势力建立紧密联系。共产国际、苏联希望同中国革命加强联系，还同欧洲革命遭遇挫折有关。一九二三年十月，德国十月革命失败，在台尔曼领导下的汉堡工人武装起义遭受镇压，德共被宣布非法。这一实践使共产国际懂得欧洲资本主义已经相对稳定，而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则有可能爆发革命，因此，共产国际决定东进。当然，共产国际、苏联同中国革命加强联系，并不是要卷入一场新的战争，而是想通过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联盟，达到同帝国主义保持势力平衡，防止帝国主义发动反苏战争。

共产国际关于苏联援助下的国共合作战略，虽然早在一九二三年下半年就已经形成，但这一战略直到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组织联系加强之后，才得到真正实现。为了加强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联系，共产国际、苏联召回了马林，派出了加拉罕、鲍罗廷、魏金斯基等。由于马林同陈独秀的争论和在中东路归属问题上同苏联领导人的分歧，以及未能尽快地推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等原因，一九二三年十月被共产国际召回。之前，一九二三年九月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两次对华宣言的签署人加拉罕来北京。不久，鲍罗廷在十月六日到广州，他从北京携带了加拉罕给孙中山的信。加拉罕向孙中山表示希望鲍罗廷到达广州之后“将会更快地推动形势的发展”^①。鲍罗廷

^① 《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加拉罕给孙中山的信》，载艾伦·惠廷《苏联对华政策一九一七——一九二四》一书第244—246页。

到广州后，以加伦将军为首的军事顾问团也到达广州。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魏金斯基再次到达上海。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国民党改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均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鲍罗廷取得改组国民党成功之后，加拉罕也取得了对北京政府的外交胜利。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订。与此同时，魏金斯基在中共中央扩大会上强调：中共工作重点在于自身发展和独立领导工人运动，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应支持左派，反对右派。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一九二四年中国工人运动振兴。二月七日，全国铁路总工会在北京成立；六月，赤色职工国际在广州召集了太平洋运输工人第一次会议，七月，广州沙面罢工，工人运动低落状态中止^①。

对广东形势产生决定影响的是共产国际、苏联支持平定商团的战斗。一九二四年八月，广东政府政治危机发生，英国买办陈廉伯妄图以武力颠覆广东政府。九月四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出了《关于中国的宣言》，号召“打倒麦克唐纳和赫里欧的帝国主义”^②。可是，一九二四年九月十六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惧怕同英国发生军事冲突，十八日，宣称发动北伐，支持奉军，准备放弃广东。这时，由于苏联顾问帮助下建立了黄埔军校，广东政府有了共产党和工农的支持。十月七日，苏联来了第一批援助武器，在鲍罗廷支持下，孙中山决定镇压商团，十月十四日取得了胜利。广东镇压商团不几天，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北方形势好转，十一月四日，孙中山离粤北上。

①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22—123页。

② 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2卷，第236页。